

社会认同视域下教会大学农村公共服务研究

杨习超^{1,3}, 陈新忠²

(1. 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高等教育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社会认同是指社会个体对特定社会群体在情感上的归属感, 需要从社会群体对个人自身利益满足等方面获取与实现。19 世纪中后期, 教会大学伴着西学东渐的潮流, 跻身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虽然产生的背景复杂, 文化侵略的原罪难辞, 但面对来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抵制, 教会大学在基督教服务理念指引下, 利用他们在医学、农学、林学、植物学和社会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方面的优势资源, 为农村平民子弟免费提供教育机会, 在中国农村开展广泛的普及教育、农业科技帮扶、乡村社区建设、基础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服务, 赢得了中国众多底层个体的社会认同, 奠定了教会大学在华百年发展的坚实基础。借鉴教会大学的服务理念和做法, 中国大学应在去功利化中推进服务社会的务实程度和贡献力度, 在与社会的融合中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

关键词 社会认同; 教会大学; 农村公共服务; 西学东渐; 社会服务; 去功利化

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6)04-0080-06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6.04.012

马克思指出, 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大都生活在特定的组织或群体之中。社会学认为, 社会个体对群体或组织的归属既受政治经济的影响, 也受内在认识和情感的驱动; 而源自内在认识和情感驱动的归属即为社会认同, 该力量在对群体或组织的认可方面显得更为持久。社会认同理论的代表人物 Tajfel 把社会认同归为“自我认知”, 认为其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此会员身份上价值和情感的认知^[1]。建构有效的社会认同, 不仅需要群体或组织将价值观与个体的感情共鸣、文化归属结合起来, 而且需要群体或组织积极地为个体谋求福利。

长期以来, 教会大学被贴上“文化侵略堡垒”的标签。然而, 本研究基于相关的历史文献考查发现, 社会公共服务是教会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 也是其宗教信仰得以长盛不衰的基础; 教会大学针对中国贫困农村的公共服务使其得到了广大农村底层群众的社会认同, 得以在华发展壮大, 并逐渐跻身社会的中心。在深刻认识教会大学“文化侵略”本质的同时, 反思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成长历程及其服务农村社会的务实行为, 有助于我国高等院校正确对待自身与外部社会的关系, 积极投身社会服务活动, 于社会认同中走向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之路。

一、推行农村公共服务是教会大学在华生存的必要路径

中国教会大学既是西学东渐的学术结果, 也是西方列强打破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的政治产物。面对民族抵制和抗拒, 为寻求自主生存和发展之路, 教会大学面向农村积极推进公共服务, 树立自身新

收稿日期: 2016-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机制与政策研究”(12BSH013); 农业部、财政部重大农技推广服务项目“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15SD03);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湖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与扶持政策研究”(15ZD017)。

作者简介: 杨习超(1972-), 男,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

通讯作者: 陈新忠(1968-),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

形象。

1. 教会大学创办背景及概况

19世纪初,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扩张、西学东渐,给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带来了强烈冲击。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1845年中英《上海租地章程》等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传教、办学打开了大门。从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学校,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创办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前身),到1952年新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西方基督新教团体在中国创办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13所教会大学。与他们本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教会大学于成立之初便背负着侵略者帮凶的原罪。

2. 教会大学创办之初遭遇抵制

1906年,清政府学部发布《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指出:“至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2]官方的不予立案文对教会大学在华立足与发展设置了很大障碍。并且,教会大学也遭到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抵制。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兴起,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呼吁收回教育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一度出现了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博士被杀事件。1928年2月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董事会条例》,收紧了对教育的控制,教会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3. 教会大学推行农村公共服务化解民族抵制

为了自身生存,教会大学不得不选择一条务实的发展路径。教会组织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基督化乡村,才能基督化中国。”^[3]他们认为,基督精神应通过服务来体现,而非灌输教义。迫于内外压力,教会大学的传教士们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思想。他们走乡涉水,广泛布施,凭借自身知识和人力资源,在中国乡村边开展教育、农科、医疗等服务,边传播基督精神。“至一九一六年末,计有六百十八所中心教会,与五千五百七十七所教堂。合计确实之教徒,约五十一万人。……此等教会,每年约医治三百万之中国病人,收入医院者约十万人。又对于十万左右华人施普通教育,一万左右华人施高等教育及专门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学校为一万五千人,外国学校为一万二千人,外国学校学生占中国学校学生的百分之八十。”^[4]教会大学师生的农村公共服务对于饱受战乱蹂躏和封建制度压榨的中国贫困农民无疑是雪中送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青年会服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知道了老百姓的痛苦苦难,一闭上眼,好像有成千成万的恳切的目光在向你求救,我们生活在他们血汗基础上,我们是人,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就甘愿做牛马呢?我们是青年,有热情,有希望,我们要同情他们,要尽量帮助他们,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终生劳苦千万一,从他们生活里告诉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青年同志为他们服务。”^[5]

二、教会大学农村公共服务的内容

与宗教相结合是教会大学区别于世俗教育机构的特殊性,也是教会大学追求社会认同的出发点。作为私立学校,教会大学的经费支持、教员招聘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的教会组织。宗教性使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也是他们的使命。教会通过在华办学校、医院,把大学的教育研究功能与基督宗教提倡的社会服务功能有效地结合起来。

1. 财务支持农家学子

当基督教传教士提出“中华归主”的豪言壮语时,民族主义者犀利地抨击了西人的“狼子野心”。教会大学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教育成就,取决于他们行动上的务实和理念上的自信,在农村公共服务中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中华留学第一人容闳,于1835年入读郭实腊夫人开办的教会小学,免学费、食宿,后入读马礼逊学校,直至完成耶鲁大学学业,非常感恩基督教会的无偿帮助。在容闳留美学习期间,教会甚至给予

其远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的母亲必要的生活补助,以解除容闳的后顾之忧。为贫困农家子弟提供免费教育、食宿,甚至衣物是教会大学办学初期的普遍做法。1915年华北协和大学的学生家长职业表显示,在82名家长中,38名是农民,17名是商人,9名是教员,7名是福音传教士,6名是体力劳动者,5名是没有什么职业者^[6]。

即便是二战期间,全球经济萧条,美国教会深陷财政困境,仍然坚持教育资助,为很多中国农家子弟提供了一条教育成才之路,一批优秀毕业生于1927年之后成为教会大学的校长。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的个人信件显示,他在新泽西德鲁大学学习期间的花费,从注册费120美元,到毕业时租用博士袍服、帽子15美元,到打印装订毕业论文30~35美元等,都由中国教会大学纽约联合董事会的行政秘书加塞德先生负责寄送^[7]。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教会的帮助下1913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学习,回国后被司徒雷登聘任为燕京大学校长。福建大学校长林景润,于1919年从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经牧师约翰·高迪的推荐进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欧柏林大学深造。1927年在福建协和大学立案时,他被任命为首任中国籍校长。在教会支持下,他再次赴美留学,于1939年获得了卫斯理大学的博士学位。1945年任职齐鲁大学校长的吴克明博士则来自山东青州市益都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在教会资助下于1919年从齐鲁大学毕业。

除了对入读教会大学的农村贫困学生提供帮助,各地教会大学还直接参与农村教育推广。早在1910年,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就由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主持,在附近办村童学校,教农民子弟读书认字。1911年,东吴大学的师生在苏州创办了专门招收失学儿童的惠寒小学,儿童入学免收一切费用,并供给书籍用品,教员由东吴大学师生利用业余时间轮流义务担任。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师生广泛劝募,筹集办学经费^[8]。沪江大学师生在校外开办日校、夜校的平民学校,还有妇女识字班等。金陵大学1934年成立乌江、大树狄、胡大王3个农民训练班。内迁成都后,金陵女子大学在华阳县中和场设立婴儿班、妇女班,教农民识字、唱歌、手工、卫生常识、珠算等。齐鲁大学为“造就乡村改进之基本人才”,在龙山服务区等地开办了各种各样的识字班、平民学校。

2. 科技帮扶农业生产

教会大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帮助建设农村:一是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对农村提供援助。金陵大学农科以“授予青年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业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9]为宗旨,组织师生深入农家田头,介绍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先进的农业技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省进行推广工作,举办农产品展览,向农民出售优良农作物种子或交换种子;在农田里实际操作新式农具,以充分展示其实际效能;开辟实验农场,采用新品种、新农具、新技术种植庄稼。在农村作物病虫害发生地,金陵大学农学师生现场为农民进行防治,利用农闲为农民举办短期培训。193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始人裴义理先生亲自到安徽和县,“肇划农村建设,并设立苗圃,育苗300万株,组织林业合作社,推行村育林计划,使和县林业有所发展。”^[9]美籍棉花专家郭仁风引进美棉“阿克拉”和“屈里斯”,在浦东育出“百万棉”。金陵大学还请来康奈尔大学育种系的专家迈尔斯,针对中华华北主要粮食作物进行改良。与此同时,岭南大学在养蚕,华西协和大学在畜牧、植物栽培等方面深入农村服务。燕京大学积极走出象牙塔、返回民众,建立清河乡村试验区,对清河周围40个村、拥有3996个家庭和22444名人口的地区进行乡村建设试验,与其他社会组织一道发起组成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包括:农业扩展、村镇工业、灌溉、筑路、建堤等乡村工程^[10]。沪江大学自1917年起每年在校园内举办乡村展览会,展出各种农副产品及各种土壤和肥料的样品和照片,以推广农艺,并通过在杨树浦开辟的社会实验基地——沪东公社对乡民开展社会服务^[11]。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仁寿和简阳开设乡村服务处。金陵大学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为救济该区农村教育起见,特开办农民训练班,……定今日开课,此次录取新生四十名,期以三十日时间完成其初步教育……此次新生中,白发斑斑者有之,青年小颖亦有之,……学生入学,不纳学费,各人自备粮食,学校供给住宿地点,所有课程,胥皆浅近实用,如农学大意,合作原理,园艺学等。”^[12]

3. 医疗救治贫苦村民

华西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所取得的卓越的现代医界成就是教会大学在医疗方面及早探索

的结晶,续写着教会大学在医疗事业上的贡献和辉煌。华西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都办有医学院,即便当时宗教问题最为保守的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反对,拒绝向国民政府立案)早在书院时期就已经设立诊所,亨利·布恩等曾热心地给当地农民和附近村庄的人看病。燕京大学校医李术仁的夫人长期在校园东邻的村庄提供慈善性质的医疗服务。曾任沪江大学副校长的董景安利用自己向美国医生高德所学医学知识为周围的村民医治疾病,之后沪江大学专门开办沪东工业医院,为当地工农诊疗服务。1883年,美国长老会聂惠东博士夫妇来到山东,创办隶属于登州学院(齐鲁大学前身)的医学系,章嘉乐在沂州、巴德顺在邹平、武成献在青州带领学生开办诊所,最后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齐鲁大学的师生经常下乡为农民看病,每逢龙山镇大集,由学校医学院派两名医士轮流前来治病,其他时间则有一名护士负责平时或复诊之病。1933年9月27日至12月6日,齐鲁大学医学院共开诊18次,正式由医生诊病的有190人,包括26个村庄;1934年有3534人受到治疗。作为教会医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以慈善博爱相标榜,收取的各种费用不足实际费用的1/3,对贫苦穷人更是分文不收,而这部分人占了总数的2/10至3/10^[13]。金陵大学开办了乌江农民医院,由鼓楼医院(原属金陵大学)派出医生协助进行诊疗和疾病预防,1934年1至8月就诊人数达6813人。乌江农民医院还在离镇12.5公里左右的区域如濮家集等处设立分诊所和服务处,以便农民就近诊治。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的报告写道:“教会素以医药事业为布道开始之机器。然而近10年来,业已失其功用,惟偏僻之地区仍需以医药为开创布道工作之前驱。”^[14]

三、教会大学农村公共服务的社会影响

教会大学面向农村大力开展公共服务,不仅赢得了广大农村基层个体的社会认同,奠定了学校在华百年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且引导教育领域有识之士树立起服务平民的教育价值观,唤起了教会大学毕业生们的乡土情怀。

1. 树立了平民服务的价值观

“面向底层,解放民智”在维新运动时期便受到了社会关注,但康有为、梁启超的先进思想没能撬动封建统治阶级的体制。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改革之前,京师大学堂仍旧是纨绔子弟镀金入仕的跳板。相反,教会大学则以务实的做法,真实地从底层入手,把平民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即便是教会大学之后为了保障办学经费,逐步招收更多付得起学费的富裕家庭学生,其平民教育思想仍然没有改变。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教会大学依新政府法规相继“立案”,改由中国人做校长。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在多个场合强调教会大学的平民教育思想,并且影响到当时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日刊》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七日(1932年)登载了北京大学教育系布告:“本系兹聘请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先生担任演讲‘中国教育问题’一科内之‘义务教育问题’。朱先生定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时至九时在文学院第十五教室上课。”^[15]朱经农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多次申明了让平民接受大学教育的办学思想。燕京大学华人校长陆志韦也是一个平民教育的倡导者,1923年12月10日第十期《教育与人生》专栏出版了陆志韦的“平民教育谈”。教会大学初期,中国依旧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政治生态,清政府开办学堂培养的不是“公民”,而是传统意义上效忠朝廷的士大夫,教会大学重视平民教育、开启民智的先进文化模式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知识由“为上服务”转向“为下服务”。

2. 唤起了毕业生的乡土情怀

与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上层路线鲜明对照的是,教会大学更重视基层服务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在教会大学毕业生中形成了反哺乡里的价值观。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广东老家,他没有听从亲戚友人建议去置田购产,而是蜗居于乡里祠堂,省出钱款创办乡村学校,呼吁政府和社会用教育救国,给予学业优异的贫家子弟财力支持。他希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

明富强之境。”^[16]章之汶来自安徽农村,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时提出“搞好乡村教育,改革农村社会”^[9]。1923年章之汶毕业留校任教,直接参与金陵大学“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工作。金陵大学1914年的毕业生陶行知来自安徽歙县农村,“他认为中国应把教育目标放在农村,提出了许多乡村教育的主张。”^[9]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提出了改革乡村教育案,对大学乡村教育系、乡村师范学校、乡村小学教师、乡村幼稚园教师之训练目标,对乡村小学、乡村幼稚园、乡村成人教育以及改良私塾等均提出了独到的建议。新中国前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博士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一生关注农民生活和乡土中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大学吴克明校长提出齐鲁大学要抓紧培养适应乡村重建工作的毕业生,学者研究项目要与当地发展相关^[7]。

3. 赢得了底层群众的社会认同

教会大学在其发展初期,用免费教育、生活补贴等慈善方式吸引中国农家子弟入校,博取了广泛的支持,经过百年打造,成就了国际享誉的著名高等学府。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人们往往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别,例如组织成员、宗教隶属、性别以及年龄群体。Tajfel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1]。Blake认为,一个组织具有一种在他的成员中共享的核心的、特有的、持久的本质;个体通常会把他或者她认同的组织特性内化为自身的品质;该组织的特征越突出、越稳定、越内在一致,内化力就越强^[17]。对于幸福感,武汉大学叶初升教授认为,“从内容上看,主观幸福感既包括客观物资福利,还包括个体的认知、情感等主观福利,具备多维度的特性。”^[18]晚清到民国,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农村底层群众赤贫无助。教会大学的资金、技术介入,给他们带来了现实的福利和希望。初尝幸福感的喜悦,使他们在情感认知上接纳了这些外人。

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他的自传《在华五十年》中表达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态度:“我在华的五十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颠沛动荡的五十年。当我第一次听说那些无异于奇耻大辱的西华不平等条约,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丑态时,我就开始深深地同情中国人民,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并借此唤醒了自己心中昏睡的民主自由理想,激发了自己实践这些理想的决心信念。我对中国人民的悲痛和希冀了然于心,与他们有情感上的共鸣。”^[19]基督新教传教士带领教会大学从教育、医疗和农艺技术等方面开展农村社会服务,广泛、深入地服务于中国社会,对普通民众心理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教会从被怀疑逐渐到被认可,甚至被崇拜。新教在华开启的捐赠风气深入人心,尤其教会大学校友,逐渐成为教会大学发展的重要财力来源。长期受压于封建君权、等级秩序的贫苦农民在思想上得到解放,逐步打破原本牢固的社会官绅伦理规范,拥护、接受并渐进树立起平等、民主的思想。

四、结 语

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智慧、思想的发源地,其行业宗旨对整个社会的走向举足轻重。19世纪初,中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打开了入华大门,这既为教会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政治便利,也使其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抗拒和抵制。为排除来自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压力,教会大学在华办学过程中打破“文化侵略工具”的外部定位和认识窠臼,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积极争取社会认同,将民生服务作为他们在华百年成长的重要基础。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教会大学资助了大批农村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农村规模化地推广农业现代技术和基础医疗卫生服务,以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凭借科学、知识和理性完成了从单纯的传教机构向高等教育事业的华丽转身。与当时的国内政治权争、国外侵略暴行相比,教会大学运用自身的知识、财力资源开展社会服务,赢得了中国社会的认同,展示了其文化的先进性,较好地履行了高等教育的服务职能。时至今日,中国教会大学虽然不复存在,但是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东吴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等校训反映的服务理念及其服务实践,对今天愈演愈烈的大学功利化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借鉴昔日教会大学的服务理念和做法,中国现代大学应在去功利化中加大推进服务社会的务实程度和贡献力度,在社会认同及与社会的融合中扎实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目前,三农问题仍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最为严峻和突出的问题。我国虽然近年来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农业现代化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国内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十倍,农业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块短板^[20]。在我国,从事三农工作待遇低、环境差、困难多,大学生不愿到农村发展和安家;农业和农村的高等教育人才匮乏,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高等教育培养了数百万计的农科大学生,但到县以下农村服务的农科大学生不到20%,毕业后真正从事农学专业工作的学生比例仅为10%左右^[21]。

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2]。作为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现代大学要在农村转型和进步中发挥榜样与引领作用。以教会大学服务农村社会为借鉴,中国现代大学在价值取向上,要摒弃追名逐利的跟风心态,弘扬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以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理念,关注农村底层社会民生,把促进农民过上有品质的生活、增强农村的吸引力作为追求方向和目标;在服务内容上,要适应新常态,努力促进农业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转变,建设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带动农村全面发展;在服务方式上,要发挥各自优势,结合各自学校的专长选择适宜路径,从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三农人才、开展三农相关研究、进行三农直接服务等方面与农村对接,在精准扶贫中帮助农民获得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在精准服务中助推传统三农向现代三农全方位转变。

参 考 文 献

- [1] 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63.
- [2] 朱有贇.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26.
- [3] 孙秀玲.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08.
- [4]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1072, 1077.
- [5] 赵秀琴. 广元服务印象记[J].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 1939, 6(9): 12.
- [6] 杰西·格·卢茨. 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M]. 曾钜生,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157.
- [7] 耶鲁大学神学院. 中国基督教大学资料[G]. 纽黑文: 耶鲁大学神学院, Record Group No. 11, Box 286, Folder 4485; Box 76, Folder 2503.
- [8] 黄新宪.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238.
- [9]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G].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18, 60, 85, 147.
- [10] 艾德敷. 燕京大学[M]. 刘天路,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5: 234-235.
- [11] 王立诚. 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 沪江大学的历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13.
- [12] 金陵大学校刊编辑部. 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开办农民训练班[N]. 金陵大学校刊, 1932-11-07(2).
- [13] 刘家峰. 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 1904-1952[M]. 章开沅, 马敏, 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96.
- [14] 邓铁涛, 程之范.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326.
- [15] 北京大学. 布告[N]. 北京大学日报, 1932-03-07(1).
- [16]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22.
- [17] BLAKE E A, FRED M.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1): 20-39.
- [18] 叶初升, 冯贺霞. 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进展与启示[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125-129.
- [19] 司徒雷登.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 常江,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0: 260-261.
- [20] 陈新忠. 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9-12.
- [21] 陈新忠. 高等教育分流打通流向农村渠道的思考与建议[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3): 36-41.
- [2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EB/OL]. (2013-12-25)[2015-12-28].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25/c64094-23938145.html>.